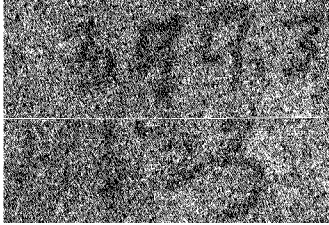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形成中的思想



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印行



## 納粹德國教育抉微

——客觀的比較英德教育。

指示今後世界教育趨勢——

斯賓諾梭說：「不要愛你的仇敵，也不要憎恨他，但設法瞭解他」。陶德斯坦（T. D. Stone）教授在這本小冊裏，給我們解釋納粹教育的原則與實施。作者首先敘述納粹主義者控制德國普通學校與大學校的方法——如何提大的諾言，如何施行更大規模的「肅清」手段。其次論談到他們的新教育的政治內容。歷史已經成爲歌頌「國家社會主義永久真理」的工具；生物學在事實上成爲反猶太的科學；教學也局限到受限制。作者於是對納粹主義者所稱，他們的教育制度予人以教育機會的平等一語，加以檢討，並且指出他的要點，已經在數估額的各國實施。他的結論是：我們如要想在戰後，使教育不再沾染弊病，必須使我們自己的教育，徹底民主化，學術研究必須不再分國界。

# 形成中的思想

Minds In The Making E. R. Dodds 原著

「不要愛你的仇敵，也不要憎恨他，但設法瞭解他」。要隨時遵守斯賓諾梭這個冷酷的忠告，實在是件難事，在戰時尤倍覺困難。可是這個勸告，却不容漠視，在戰時亦然。理由有三點：第一、我們要打擊敵人最易受攻的地方。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研究他的思想同軍備，並盡力心平氣和地估量這兩方面的實力同弱點。第二、我們要估計到自身犧牲的必要。一個民族遭遇到像英國今天所遇到的危險，就應該絕不誇張地告訴他所抵抗的，到底是什麼，也應盡力探知屈服的代價是什麼。第三、我們要阻止這些危險的復生，而正如一切預防藥品，必須以正確的診斷為根據，換句話說，必須對敵人的思想，有真正的瞭解，勿因憎恨或躁急的慈悲幻想而曲解他。

論到教育制度，有五項主要問題需要提出：牠的目的在那裏？控制牠的是誰？牠所教授的是什麼？怎樣選拔學生？牠是否有效率地進行牠所預定的工作？現在讓我們根

據這機關，來討論德國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施行的新教育制度。我們因為欲獲得客觀的答  
案，所以最好竭力以德國官方的資料為根據。

### 以教育鞏固政權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的教育部公告，曾對新教育的目的，定下了官方的主義：「藉  
着喚醒健全的種族力量，同養成青年人具有自覺的政治目標，使家庭，家族與國家  
裏的青年，團結起來」。

其後德國教育部長曾向一位來訪者，用較為明白的言語，闡析上面一段古怪的諛語。  
他說：「我們教育的全部功用，就在製造國家社會主義者」（見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  
日人民觀察報）。為確保教育能發揮上項功用起見，德國的教育制度乃於七年之內，從  
頭到尾徹底改革。自上而論，如果引用柏林大學校長的話來說，教育的目的就在「消除  
過去自由時代的渣滓」，以便產生「國社主義國家內的國社主義大學」。自下而論，如  
果引用德國某重要教育家的話來說，初級學校必須培養「國家保護下學習世界透視的  
民衆學校」，而根據教育部概況的言論，中等學校裏合乎人類發展理想的文化，必須取消

代以一直統與歷史運命所決定之「德國人」的理想。

希特勒的信徒並不是最先倡議這種教育理論的人，但是直到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大國的元首，才敢向他本國的全體青年這樣說：「國社主義運動陶冶了你們；你們從牠那裏得到制服，你們將畢生爲牠服役。這是一個奇跡；我們的民衆教育已經在你們之中，鍊成連貫中環的初環。這個連鎖隨着你們而被端，唯有最後的一個——國人攢入墳墓，——鎖才告終止」。

假如德國的計劃實現了，那麼希特勒所指的那件奇跡——教育，或文藝復興時代以來就已經開始改換歐洲而目的那種偉大解放力量——將於今後變爲鞏固現狀的工具，成爲阻止變化的最有力的保障。連鎖的最初一環，已經在德國青年當中鍊成了，而一六四八，一七八九年，一八四八年，甚至一九三三年的革命動力，俱將於明日成爲新羅馬帝國主義的護符。

## 教育所受的政治統制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隨着我們第一個答案而來的。假若今天一個六歲的小孩，純

轉變爲將來政治上唯命是聽的成年人，那麼他祇肯把他所受的教育，託付給一個權威者。這位權威者就是國家，說得確切點，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雅盛納新價條」中所確定的那個三位一體的神祕怪物，所謂「國家，黨，同阿多夫·希特勒三位一體」是也。這個「新總意志」怪物，若引用希特勒的話來說，「不能把他的青年交給任何人」，而過去七年來的歷史，就是逐步控制，或消除所有獨立教育機關的一部歷史。這裏所指的獨立教育機關，是地方政府，校長與教授，教會，家長聯合會，以及各種自由的青年運動所控制的教育機關。

國家社會主義曾逐步圍攻這些潛在的反抗中心。在最初的階段裏，牠盡力施出分化內部的慣技：利用不兌現的諾言，以便在獨立的營盤裏，獲到一塊立足地，並向反抗者施行賄誘，以破壞他們的聲譽。自一九二八年起，希特勒的祕密工作人員，就開始在學生營中活動，允許將來給他們好的職業（好的職業不都是操在猶太人的手裏嗎？）並開始煽動學生反對猶太籍，以及自由或和平主義者的教授。一九三二年，終因各大學當局的怯弱容忍，與勤苦學生對於政治的漠視，遂使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少數人，幾乎全都控制

代表學生言論的機關，進而利用這些機關來鎮壓一切國社黨以外的呼聲。他們在青年運動中，也採用了類似的策略。新黨爲滿足右翼的理想，就提出恢復國家榮譽的諾言；爲滿足左翼的理想，就提出建立社會正義的諾言，尤特別提出教育機會平等的諾言；爲符合兩方面起見，更表示他們將建立一個新德意志。這個新德意志，將爲青年的樂園，使青年不受家長，校長，同僱主的指使。教會也得到一項諾言，就是「在不危害日耳曼種族生存，及不侵犯日耳曼種族道德習俗的範圍內，國內有宗教信仰自由」（見國社黨綱第二十四條）。希特勒並且允許教會對於教育上的問題，「可以得到發揮適當勢力」的權利（見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的演詞）。這第二項諾言提出以後的第五天，天主教的主教們，就宣佈撤銷其對於國社主義的禁令。

一九三三年而後，提出諾言的方策，每有增補，或代以另一種方策。國社主義同教會衝突經過的故事，要在這裏敘述起來，未免太長，任我們根據一位官方發言人之所言，祇能在這裏說德國全境的教會學校，幾已完全改爲公立學校；初級學校的祈禱儀式，已經取消；講經的時間，也已大減；凡具宗教性質的青年聯合會，幾全部解散，原有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號的宣言，要求青年一統，必須加入希特勒青年團。希特勒青年團所發行的教育手冊，把基督教、共產主義、馬克斯主義並列爲「盡力求取統治全球」的三種力量，並斥他們「否認種族、社會、或國家的人的關係，否則就將失去他們本身的目標」。一些青年運動的殘餘，也在一九三三年被清除。凡具政治性質的青年團體的領袖，俱被警察檢出，至於無黨派的中立團體的領袖，則被誘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一九三三年還是採取自由入黨制），並引誘的方式早允許他們獲得「領袖會議」議席（事實上，青年團的領袖會議始終未發揮作用）。作者很有理由相信若干團體，仍繼續秘密活動，以迄今日；（最近今天假有人公開散發從前青年運動的舊歌本，就是違法行爲）載一九三九年七月公佈的法令），被查出從率團活動的人，也會受到野蠻的懲罰。

如何確保以黨統治大學的問題，更爲複雜。第一步是大部根據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頒佈的文官任用法，針對大學教授中的「非雅利安人」同一「政治上所不需要的份子」，施行著名的肅清運動。據德國某官吏最近估計，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因該法及以後補充條例的實施結果，各大學同專科學校的教員，有百分之四十五被撤換。學生

團體也以相似的方式，予以肅清。一九三三年內，約有七千「非雅利安」籍的學生，因為許多條例實施的結果，而被迫離開大學。同年八月所頒佈的法令，更規定普魯士境內各大學，必須清除一切有待取馬克斯主義者的態度，或反國家態度的學生。凡在言論，著作，或行動方面，與國家運動表示憎惡，或侮辱其領袖者，以及一切和平或賣國團體或相似組織的成員，在清除之列。這樣一來，反對政權的政治份子，也被肅清了。這一步完成以後，第二步就是根據權力集中及指派的原則，修改大學的組織法。本來一個德國大學是由大學評議會、教職員大會，同一位每年公選的校長管治的（校長的職位，可比於牛津劍橋的副校長），現在則由政府所推薦的三個人管治：一位是校長，一位是教師方面的黨組織代表，一位是學生方面的黨組織代表。他們的任期都是無限的。教務長，校長，同大學評議會的其他評議員，也由校長指定，教職員大會則降格顧問委員會的地位。最後，因為恐怕「政治上所不需要的份子」，又有一天潛入大學，所以教師的自聘權，也被剝奪了。根據最近的決議案（見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教育部公告），所有大學教師（不僅以前所規定的教授），今後均為公務人員，由教育部任命，未經教育

部許可，不得從一個大學轉入另一個大學，但教育部却可以（事實上也已經如此）未得他們的同意，就把他們調動，和調動其他官吏一樣。

普通學校也採取相同的步驟。普通學校較大學，尤容易落網，因為邦政府早就對牠們實施頗為嚴厲的統制，而普通學校的校長，自一八七二年以來，就已經列為公務人員，不能享有像大學教授所傳統享有的學術研究自由權，（雖然共和時代的聯邦政府，大體上也曾鼓勵個人的創造力，並以良好態度對待一般實驗學校）。可是希特勒的信徒是不肯微待從事的。一九三三年二月，教育部長就已經決心，「以其職務上所需要的一切殘忍」，消除初級學校中所有「非日耳曼性」的事物同人。同年七月，教師們又接到警告，要他們同社會民主黨斷絕一切或有的關係（當時無數的初級學校校長，都加入這一黨），並且必須認識「我的奮鬥」一書裏的原則。這一年年底，特別委員會曾把十六萬名教師的政治調查表，加以研討，有許多教師遂被開除，其餘的教師，則由國社主義教師團，授以政治訓練。這個國社主義教師團，歸併了所有舊有教師組織，但牠的目的，不在保護職業上的權益（公務人員採取集體討價還價的行動，早已禁止），而在「教

育全體教師。使具有共同的國家社會主義觀念」。他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特設立「教育營」，規定所有教師必須入內受訓。自初級學校以至大學的每一個教師，必須盡忠盡特勤，而中等學校的任何職工（法令中特舉出女校役同火伙爲例子），必須書面聲明自願遵守國社主義國家的法律。這個國家竟如此謹慎地保衛自身，以免沾受污穢。

其他可能成爲反抗活動中心的地方，也同樣使其納粹化。學校圖書館裏肅清了猶太人的著作，讚揚猶太人的書籍，不能向日耳曼民族或北歐民族表示應有尊敬的書籍，以及「非日耳曼派態度」的等等書籍（見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福蘭克福特日報）。學校圖書館購買的，必須限於教育部認爲「適當」的書籍。

一九三四年五月，全國獨一的教育部，宣告成立，因而消除了各邦自創教育制度的可能性（在共和時代就有這種情形）。東縛德國兒童的鍊圈，至是全部告成。他的身體同靈魂，俱屬國家。國家同黨是一體，而黨同希特勒也是一體。其他任何入俱不許觸犯他。

## 新教育的政治內容

從字面上看。一個德國初級學生的課程，很像英國初級學校的課程，或是讀者的課程同上課的國，這口說無憑，其實，由我們聽得各報的報導，中等學校的情形，大體上也是如此。可是第一，在法法審查，就可以發現一些罕有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生物學在各種中等學校裏，被列於必修科的地位，自是初級以至最高級的學生，都要修讀。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的法令規定「在必要時，不惜犧牲算學同外國語文課程」，以便教授生物學。其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又有一道法令，對此加以下面的解釋：總共下令「任何青年男女，凡未能充份瞭解血統純潔的性質與必要，不得出校」。於是生物學所必須教授的課目，就是官方所確定以下面一些課目：「血統純潔的保持；種族雜交的危險；猶太人問題；寧倫法律；與國社主義的觀念與法制所完成的種族改革。說得明白點，「生物學」變成了反閃族主義（反猶太觀念及思想）的必修課程。

其他使人發生興味的特點，是主要的外國語中，已取消了法文，專門教授希臘文的學校，在數目上也有迅速的減少。在共和政府時代，各種學校都有各種語言的綜合教程，至於英法兩種主要近代語言，則必須任選其一。但是自一九三八年以來，英文成爲各

總的必修科。拉丁文在所有男學校中，也是必修科，而法文則成爲選修科。在中學的最後三年當中，或者可以有幾小時的法文教習，這種情形，或許映示希特勒相信具有「黑人特性」的法國文化，已經沒有前途了。專門製造未來政治家同外交家的阿多夫·希特勒學校，自一九三九年以來，就把英文同義大利文列爲必修的兩種近代語文；德蘇協定簽後，中等學校同大學又鼓勵學生學習俄文，這都是很堪重視的。古文中學校仍有希臘文的教程，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頒佈的法令，使這一類學校的數目，大行減少——一九三七年的時候，普魯士境內就已經從二百七十所，減爲一百零九所，烏得坦堡境內原有四十九所，也減爲三所。女子教育方面，已不再有希臘文的教程。拉丁文的教程也不多。在德國一度受到特別尊嚴的古典學術研究，事實上似乎已在中學同大學裏，進入消逝的數量。一九〇〇年，全體中等學校校長中，祇有三分之一強，具有通曉古代文字的資格；到了一九三九年，合格者祇占百分之十五，至於試讀學生中，合格者還不到百分之八。一九三五年，全德國各大學裏，祇有三百八十名學生對於古代語文專家的地位。尚不及牛津大學一個學校裏的數目，比起五年以前的數目，尚不及三分之一。

此課程的改變更重的，就是教學精神的變更。以前德國流行一句話：「所謂合乎日耳曼的性格，是指為本身設想而做一件事。」在今日的地位，尤其在德國學校裏，却沒有一件事是為本身而做的。每一種研究必須對學校的「政治工作」有貢獻，而學校的政治工作，就是以國家社會主義的永久真理，介紹給青年，並教育他們養成堅毅的國家主義的生活方式」。這種工作，開始於初級學校，那裏所用的，是全國一律的新課本，其中含有「我的奮鬥」和其他具有法費性的國祖主義著作的撮要。在中等學校裏，政治工作則到揚于最想不到地方。「教育部手冊」通知教師在講解德國文學的時候，應該隨時以種族原理為中心；講授地理課程的時候，必須「就國社主義者的精神，加強聽者接受政治思想行動的決心及能力」。化學教師除了向學生解析氣體同炸藥的軍事用途外，還要說明「日耳曼人，尤以北歐日耳曼人對於化學研究的有力貢獻」。選擇古代文學課本的標準，也不應該像從前一樣，選出那些「以歷史文化或審美立場為主要根據」的著作，而應該選擇能夠「表現北歐日耳曼人所具的相似特質」的著作（這也就說明為什麼課程中有齊諾峯所著的斯巴達憲法，同史多紐的奧格斯達德，而反沒有攸里比特斯

。底摩斯塞尼斯，卡杜魯斯，魯克里底斯。同。奧維特的地位）。生物學以外，對政治工作沒有幫助的課程，自然是近代史。現在初級學校的第五年級和中等學校的第五及第八年級，完全教授近代史（自俾斯麥到希特勒）。官方所規定的中學課程裏面，有的是「俾斯麥保證的意志反抗羅馬教同民主主義者的虛偽」，「共濟會社的擴充同教會對猶太人受洗禮所取的態度，如何增加猶太人同日耳曼人血統的混雜程度」，「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舉止的崇高性」，凡爾賽（這一項內容，講解極爲詳細），「瀆職荒淫腐敗的魏瑪共和國」，「馬克斯主義者同資本國際的盟友——政治性的天主教」，「希特勒解放德國綏靖歐洲」等等。此外，德國兒童也要不斷聽取政治講話——或利用廣播，講解「生存空間」與寧堡的「國社黨黨日」，或利用演講隊，講述「黨與國家」以及挺進隊的發展，或利用希特勒青年團的「晚會」，講述「日耳曼人的德國」與「德意志的團結」。一個兒童決無法逃避這一切，不論他如何討厭牠們。他的眼耳或者也被聯結在一起，因爲他還得遵守法令（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頒佈），每年至少四次自己拿錢看「國家政治影片」。



他證他入了大學以後，情形就不同吧？其實並沒有十分的區別。在中學時代，他是希特勒青年團團員。現在他是挺進隊員，因為引用斯持肯博士的話來說：「德國大學中沒有一個人低於軍中挺進隊員的地位的」。他除了接受挺進隊的操練外，還得至少有三年級的強制性的戶外運動訓練。受訓的時候，特給予積分，假若積分不夠，或者操練不力，就有被開除可能（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頒佈的命令）。國社主義學生團把「觀念政治教育」灌輸他們；這個學生團代替了舊有的學生團體（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期間，自從海德爾堡某貴族團體的團員大聲討論「總理吃蘆筍的樣子」以後，舊有的學生團體，就被禁止）。其次，今日的學生已不能像從前一樣，享有自由選擇課程權的學生團體，就被禁止）。其次，今日的學生已不能像從前一樣，享有自由選擇課程權的學生團體，就被禁止）。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頒佈的命令，規定第一年級的學生，必須修讀有關「種族與部落，人類學，史前學，以及日耳曼民族的政治發展歷史，尤其百年來日耳曼民族的政治發展史」等等課程，俾能熟知「魏森沙哈特的種族基礎」。這些課程大都列入新的講座，名稱也很奇特，如「民族性社會學」或「家族與家庭研究」。一九三六年海爾德大學的重要課程，都是一些論到民族與種族，德國古代宗教性質，德國猶太人的歷史。

國社主義哲學根據，國社主義哲學與種族原理等等的課目。學生是否能夠從這些課目中，得到心得，也要在以後加以致驗。假如他應赴政府舉辦的師資考試，那麼考試官就要提出「政治觀念的基本問題」，向他詳加考問（自一九三七年以來，這種考試制度，代替了以前的哲學口試）。假如他完成了一篇考取大學博士學位的論文，那麼他就要遵照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的法令，把論文提交「保護國社主義文學黨考核委員會」，請求通過。假使委員會發現文中有非正統派的「政治觀念」痕跡，就可以令其修改，或禁止發表。瑪秀·阿諾爾德於一八七四年在文章裏寫着：「法國的大學沒有自由，英國的大學沒有科學，德國的大學却具備兩樣」。其實上面所說的，才是阿諾爾德眼裏的學術中心，對於學術自由所取的現有觀念。

### 機會均等？

在整個十九世紀裏，兩種教育制度在歐洲並行發展。其一是富人教育，從私立的預備學校開始，一直到公立學校，中等學校，以迄大學爲止。其次是平民教育，牠的開始

與終止都在公開的初級學校裏。前者是培養領袖人才的教育，牠的口號是崇高的文化；後者是培養服從性格的教育，牠的口號是識字同忠順。如果引用普魯士某教育部長的話來說，這兩種教育制度之間，正隔着一道「萬里長城」。想爬過這道長城，極爲困難。德國在下次大戰之前，每一萬個初級學校學生中，祇有一個能夠受到中等教育；英國的情形，也不見好得多少，直到一九〇二年設立國立中學校，和一九〇七年實行「免費額」的原則以後，才改過來。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時代的人物，從他們戰場中的同伴那裏帶回來了許多觀念，其中之一就是沒有均等教育機會的政權平等，必然是假的民主主義基礎。英法德三國都提出消除那道長城的要求，結果每一國都有所成就，雖然成功的程度，未能達到原來的期望。在英國，一九一八年的飛盧法令規定：不應該使學生「因爲無力交納學費，而被阻享受其可以受益的任何形式的教育」。這項原則尚須在事實上，求其實現，但在過去二十年裏，新的中學同新的大學，不但有很速的發展，而且窮人子弟進入牛津劍橋的，也大有增加，並不因一九三一年經濟危機的阻撓，而受影響。不過，假若有人問，一

個屬於最貧窮階級的兒童，是否能藉着教育的梯子，一帆風順地爬上高的位置，得到高的報酬呢？答案必定是否定的。這自然是可能的，而且也有若干人成功了，但總是困難的，而且是例外的。法國更完成了尤為劇烈的改變：此後教育不應該有兩個制度的，教育制度一元化要求，在原則上被接受了，而自一九三〇年以後，中等學校的學費，也逐步取消，雖然因為維持津貼的短絀，同沒有統一的選擇標準，而致不能發生全部的改革作用。在德國，魏瑪憲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設立基礎學校，強迫兒童入學。自一九二〇年以來，每一個德國兒童，不論貧富，都有入公立初級學校受基本教育的法律上義務（身體不健全者得免）。憲法（第一百四十五條）又規定所有兒童，至少要有一部份時間受教育，以迄十八歲為止。這一點從來沒有完全實現過，不過許多城市裏，却為工業界的少年，設立了延續學校，強迫他們入校（飛渡法令也有相同的規定，但始終沒有實行）。魏瑪政府最顯著的失敗，就是沒有為工人子弟設立高等教育機關。中等學校同大學，的確失去了卓越的上層階級特質，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子弟，為了社會名望同他們想像中的經濟保障起見，湧入了大中學，而不顧及他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能力。但是到了一九

三一年，佔着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的工人階級，他們在校的子弟，在中等學校的學生總數中祇佔百分之七，在大學生總數中祇佔百分之六弱。

國家社會主義沒有得勢的時候，牠向牠的擁護者所提出的許多諾言中，沒有比施行真正教育機會均等的諾言，更為明白而動人了。黨綱第二十條寫着：「為確保每一個有才能而勤奮的德國人，能夠受到高等教育，以便擔任主要職務起見，政府必須澈底重建我們的整個教育制度……我們要求貧苦家庭具有智慧的子女，受到教育，不論其階級同職業，由政府供給費用」。

這項諾言兌現了沒有呢？一九三九年三月，挺進隊在牠的言論機關率直宣佈沒有實行。美國教育局在一九三八年發表的「德國教育」那篇權威報告裏（見教育局第十五號公報）寫着：「談到如何使中等同高等教育更普遍，更民主化一節，目前的趨勢，顯然是捨棄了共和時代的政策。改革初級學校以至中等學校的制度，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困難了，準備入大學，而且得到允許入大學的學生，比從前更少了，不是更多了」。德國的官方統計數字，就明白指出這種真相。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八年間的全德國中等學



入學標準也公佈了，由大學生同中學生選擇。這些標準非但限于智力方面，還包括「品行」，體力上的合格條件，同雅利安血統（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以來，猶太人不准入國立學校）。此外，想進大學的，還得有一張黨部首長的保證書，保證他在政治上的可靠性，同一張希特勒青年團的服務成績表。但是繼續不停的減縮現象，並不是單單由上面這些辦法促成的，因為減縮的程度，較政府所期望的，尤進一步，以致在最近的兩三年來，尚且引起政府的嚴重憂慮。一位高級官員在一九三九年表示，以後幾年裏的大學畢業生，每年求過於供者，至少有八千人，不久以後，甚或將達到一萬五千人。究其原因，完全是經濟方面的。中等學校的數目，雖在一九三六年，從九年減為八年，大學的課程，雖然也在最近予以縮短，但取得學術職業的準備期間，却比共和時代，更為長久，因為其中還得加入了兩年強迫性的軍事訓練，同六個月強制勞作服役。中等學校的學費，尤高於一般英國受政府津貼的學校，在一些地方，甚至比共和時代，取費更高。普通學校同大學都沒有獎學金的制度，學校祇從學費收入項下，撥出百分之二十為資助費；資助方式有一半是減收大家庭出來的學生入學費，一半是允許「有資者」免費入學（天

資的判斷，自然同他們在希特勒青年團的表現，有「決定的關係」此外，「特別有才  
能」的人，可以得到國家的一點有限援助。免費額的總數，並未公佈，但牠的比例，必  
定比英國低得許多（英國資助學校的學生，有百分之四六。九免納學費，百分之九·七  
減納學費）。最近調查柏林十歲兒童三萬五千人的結果，發現其中被調查員列入「有特  
殊天資」階級的，有一半是窮苦人家（手工業工人，低級書記員，商店助理員等等）的  
子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有天資的窮苦兒童，有百分之四十五，不能受到中等學校教  
育，至於被列入「有才能」的兒童，也有百分之六十二，不能受到中學教育。據估計，  
德國大學的學生，有百分之十直接得到政府的經濟資助，其中有大部分祇得到很有限的  
數額（見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福蘭克福特日報），而根據英國資助委員會的最近報告，  
英國大學生中，却有百分之四十，得到這種資助。

### 新英才教育

德國祇有一些特殊的學校，似乎還保存着機會均等這類東西，那就是聞名的，稱爲





和「最終選拔營」。再精細地加以淘汰。他們在兩個選拔營裏，要受體力同智力的測驗；體力測驗考着擊拳鬥，智力測驗則包括有關黨組織同反共公約等等一套考題。最後的選拔，取決於黨裏的高級人員。「拿破拉所」也用大體相似的方法，選拔年齡達到十歲前學生。希特勒學校，以三分之一的時間，從事學生體力訓練，三分之一從事希特勒青年團活動，三分之一授課。雷博士教學生的格言是：「學問要高深，服從要盲目，信仰要在熱烈。」「拿破拉所」特別看重「劇烈」的運動，如擊拳鬥，舞劍，騎乘，摩托車駕駛，白滑翔。據這些學校的視學長說，牠們是綜合古代斯巴達教育，耶穌學院，英國公立學校，和舊普魯士軍校的長於一爐。據雷博士說，牠們使德國對於一德行可以授與嗎？這一古代問題，第一次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許多名譽府製造出來的人物，達到八歲的時候，就可以贈與一個國家的每一級獎章，但是等到二十五歲的時候，這些老希特勒青年團又已經進一步的審度。他們在黨的監督下，經過七年的實際生涯以後，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和黨員聚在一起，在一種新的政治完成學校，研究四年。政治完成學校的作用，是同時教授他們長官的騎士武勇行徑，和阿夫雷得·羅森堡的種族哲學。他們

孤處在靜僻的深山，遙遠的鄉村中，克服了精神上的困難畢業後，最後乃成爲國社主義的完人，也就是執行希特勒歐洲新秩序的新啓示使者。不過，一想到這些特別選拔出來的人才，其中最早的一批也得在一九五四年，才能訓練完成，又使人輕輕地鬆了口氣。目前，政治完成學校祇用來教授峻刻的主義教程，以教導那些出生過早，以致來不及進入阿多夫·希特勒學校的前途無限的青年。

### 新教育是否有效？

現在我們討論到五個問題中的最後一項。論到這裏，我們是從既定事實的階段，走到一個必須以主觀印象爲一切判斷根據的階段。但是這裏也依然可以援用一些客觀的測驗，而其中爲教育當局所重視的一個測驗，就是看學校班級的大小：大的班級因爲不能注意到每一個學生，所以不能有效率。根據這種測驗的結果，新德國同英國比較起來，要差一層。一九三八年英格蘭同威爾士每三十個初級學校學生中，有一位教員；德國則每十二個學生中，才有一位教員。中等學校方面，英格蘭同威爾士的中學校，每班人

數差遠是三十人，例外的有三十五人；而德國所規定的最高額，是高級班次三十人，中級班次四十人，初級班次五十人。第二個顯著的比較測驗方法，就是看師資的標準。這種測驗，最容易援用於初級學校。英格蘭同威爾士的師資標準，曾逐漸升高：一九三一年的時候，初級學校教員具有大學學位的，不到兩千人，而一九三八年，却將近有一萬兩千人。德國的趨勢恰好相反：國內一些地方的初級師範學校學生，本來在共和國政府時代，還可以得到享受大學教育的機會，現在希特勒的政權下，全被取消了。最近甚至沒有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也可以入師範學院（見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福蘭克福特日報）。造成後一種事實的原因，是任教職業的所有部門，全感到補充人員的缺乏。一九三八年，已婚的婦女不得不應召到初級學校任職，中等男學校也聘請了女教師，這兩點都是違背一切國社主義原則的。（見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及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福蘭克福特日報）。至於大學方面，盧多爾夫博士曾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的教育部公告裏說過：「許多研究部門裏，今日尋不到合格的助理員。事實上，大部份的專門學科裏，常常找不到一個補充人員來填滿缺額」。一位開名的國社主義教授，甚至認為大學當中，將有

三分之一，因為缺乏教師而被關閉。

中學生同大學生一樣減少，而另不能吸引足額的教師來供給所需的教育制度，一定有牠的毛病。教師的減少，在學生中知道，有一半是由于經濟上的原因。初級學校教師的實際薪俸，比他得在一九一四年得到的還少；一位二十八歲的女教員，她所賺的，比一位年輕的打字員賺的還少；一位男教員，也比一位年青書記員賺得少（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福爾克福特日報）。中等學校教師同大學講師，也同樣得到低的報酬。盧多爾夫博士在上述的教育部公告裏，解釋政府不能提高薪俸水準的理由，是「因為整軍軍費佔居第一」；但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九日福爾克福特日報所發表的一篇可注意的論文，却揭發了新德國高等教育不能普及的根源。他指出大學已經失去原有的領導權要求，大學畢業生在新社會裏的作用，不是以文化人的資格，居於領導地位，而是以技術人員的身份來服務。在希特勒的世界裏，教育不再是權力；藉着大學的道路，以取得權力的那條舊途徑，已經被眼光銳利者放棄了。他們轉向新捷徑走。這條新途徑開始於德意志新黨民族，先經過黨內的組織，再逐漸經特別的黨學校的政治完成學校，以達到黨裏

的高級地位。

但是我們切勿推斷普通德國教育的效率，不是達到他所求的新目的。牠不能，也未會產生具有獨立判斷的思想，牠的目的也不在此。牠的目的在形成新秩序的服從的，有益的的工具。大部份具有客觀頭腦的觀察家，都承認牠在這一點，是大體成功的。就個人論，這些有人性的工具，不能有最高的品質，因為他們是大批生產的，而生產成本也低到無可再低；不過就一般而論，他們全是可靠的。作者不懷疑德國各處，還有未經過革新的教師，繼續進行靜默的智力怠工，德國境內，也必永遠有人忠實相信，並且有勇氣來穩定：永久的價值是不能互相聯絡的。美國史家查爾斯·畢爾德對德國這一代青年所下的下面斷語，除了一些部份外，大體都很正確：「希特勒政權如果繼續數年，德國人民就要變成幾乎完全不識外面世界，不明網際信條以外所有觀念與利益的一個民族。除非發生了經濟的崩潰，或內部分裂的戰爭，否則向上述制度相反的觀念，當難輸入德國。」

## 前進中的陰影

德國如此；歐洲怎麼樣呢？作者所述的事情的中心要點，並不是德國所獨有，也不僅限於德國疆界。總之，在大學的範疇裏，牠同過去一世紀促使德國變成一個世界學術中心的那些方法與思想，完全相反。新的原則同技術，有一大部份是鑄鑑於蘇聯或義大利；德國所獨有的，祇是牠們應層上的死板徹底化而已。這一點是重要的。牠指示這個戰場裏的最後敵人，並不是德國，而是一種觀念，而這種觀念，正是一件容易流傳的東西。牠指出我們不是對抗一種國家性的離心論，而是對抗一種國際性的威脅。

自去年夏季以來，這種威脅的輪廓，突然在西歐變得非常顯明。挪威，荷蘭，法國——假如我們要曉得投降的代價，祇要向這幾個鏡子照一照。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作戰失敗就等於丟失殖民地，賠款，吃的東西更少，工作更困苦。假若對希特勒作戰失敗，也同樣如此，但牠的意義尤不止此。你們試向那幾個鏡子照一照，就可以看到國社主義「文化」國社主義「教育」的面目反照。挪威同荷蘭的普通學校與大學，已經肅清了

民主份子。在挪威，教師學生甚至小學生，曾大批被捕；在荷蘭，假如校長用「不傳不友好而且對德絕對相反」的精神來授課（引用德意志首長的文雅字語），假若學生「惹惱了反猶太人的措置」，而仍舊能夠逃避集中營，就算徼倖。最資借鑑的是法國，因為法國還是一個自主國，不受德意志首長統治，而由法人自己統治。這些法國統治者自以為懂得國家為什麼戰敗：他們歸罪于「許多法國人所受的壞教育」（見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盧邁·羅米亞在菲加洛報所發表的論文）。於是他們就從事糾正——實現希特勒的教育。法國學校似乎太多自由，太多平等。如果引用貝當元帥的話來說，牠們在將來所得的「自由限度，要同必要的管轄權相符合」，平等的限度，要同不可或缺的階級組織權相符合」（見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兩世界評論月刊）。牠的最重大指示，是教育制度的一元化——我們這一時代最重大的教育成就——將行消逝，而初級教育同中等教育間的長城，又要重新建立。為補償起來，將來還要發動國家統制下的「青年運動」。以前法國小學教員同英國小學教員所共享的自由選擇課本權，已經被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三日頒佈的法令取消了。此後凡有贊同一七八九年思想的書籍，決不容存在



。肅清教師或德國模範的運動，也是可以期待的。法西兩國已有了很好的開始。像新近榮獲皇家協同柯甫萊獎牌的法西兩學院教授羅維，或吉文那些人物，也都被除了。利用行政上的方法，以進攻小學教員的步驟，也已經準備完成了（小學教員是法國自由職業團體中，最激烈集團之一）。從整個情形看，除了他所引起強大反響外，就像是隨官抄襲一九三三年希特勒黨徒所行的政策：用同樣的甘言蜜語談到道德復興與清除黨派間異見。而這些甘言論調，正是針對將來可能或爲宣傳專制政治的中堅分子的每一個，或每一個機關，於行進中。這種情形，不是法西兩文化傳統的象徵，正如國家社會主義，不是日耳曼文化傳統的象徵。這種象徵的，是使入歐洲另一個神經樞紐的傳染病。這種疾病，使西方人類有變成癱瘓的危險。

英格蘭海島今天仍沒有染上這傳染病。這種病是投降的精神代價、的確，作者會時常遇到天真的青年人，他們很嚴肅地對我表示，他們不能辨認清楚像希特勒的那些「法西斯主義者」，像邱吉爾先生的那些「隱存性的法西斯主義者」，同那些像比溫先生的「社會法西斯主義者」。假若讀者當中，有這些天真的青年人，一直讀到這本小冊的結

尾。還不能分出其間的區別的話，那麼作者就要極嚴重地，請他們向附近的難民請教。即使是年輕的人，也不應該濫用重要的字語，尤其不應引用不當的字語，而不設法找出牠們在生活中的真正意義。一法西斯主義者「是一個極重要的名詞，牠所代表的東西，比我們常用其原形所不表達的人的那個名詞，更為其危險。

### 民主方面的新教育答案

作者對其餘的讀者，不想提出勸告，而要提出一項最後的問題。一旦歐洲驅除了牠體制內的集權主義的毒病，一種健全的教育，又可以怎樣設法避免舊病復發呢？作者不曉得全然的方案，因為確有一些份是以不能預測的偶然情形而定的，但答案中的幾個要點，作者已逐漸提出。

第一，教育機會均等，並不能再成為政治家口頭上，虛有其名的方案，而必須見諸事實。不僅在本國如此，且及於我們能力所及，使大陸上也如此。等到民主主義履行了教育機會均等的提出，而之後，履行其諾言的時候，他也就履行了牠的本質，同時對於牠

反抗希特勒主義的立場，也有裨益。牠將在事實上向英國人證明——英國人也會要求明白的證明——他們所爭取的，是真正的原則。若對德國人方面而論，假如戰爭上的失敗能使德國人抓到俾斯麥河希特勒所否決的那些機會，牠也許就是一種新健全政治的開始。

第二，英國同大陸上的職業教育，必須自覺地適應計劃經濟的需要。希特勒所以能夠徵召百萬以上的失業青年，投到他的旗幟下，由無數的學生同沒有職業前途的年青自由職業者來指導，大部份的理由，就是魏瑪共和國在職業教育一方面失敗了。在這一國家裏，我們往往願意讓這些事情，順着供求的定律，徐徐演變。但是在一個專門技術的區別日益增大的社會裏，我們不能再聽憑牠這樣下去了。

第三，今天希特勒教育他的人民成爲國社主義的工具，所以在將來，我們必須教育他們的人民同我們的人民，成爲自由社會的負責公民。這種目標，不是靠着「如是如此」式的傳授法，就可以達到的，而要使教育內容與方法，能同社會的目的自覺地相適應，纔能達到。作者不願牛津同海德爾堡設置了民主主義講座，一若德國人在萊頓大學

設立國家社會主義講座。關於「教育爲宣傳」這項問題，民主方面的答案，並不是一教育爲反宣傳，而是「教育乃所以預防宣傳」，乃所以培養那種極爲可貴的品質，也就是美國人所稱爲「抗拒售貨術宣傳」的品質。在近代生活的情况下，各級教育的內容同方法，應有顧及上述品質，加以重新審慎審劃的必要。

最後，所有國家的教育，必須設法消除國家主義的病毒。這一項工作，也許不像所說的，那麼絕望。一九三三年以前，就有很多針對這項工作而興的組織——國際青年營，國際學生會議，國際間教師與學生的交換，國際性質的獎學金，例如牛津的羅特斯獎學金，同專爲留德的外籍學生而設的洪堡獎學基金。其後甚至發動了中學歷史課本的清毒工作。這次戰爭結束後，假若要拯救歐洲勿走到最終的解體，唯有以決斷的新精神，同更廣大的規模，恢復那些組織。希望這一類重大事業的組織，經費，不再靠着私人的慷慨義舉，<sup>(6)</sup> 或藉着國家的熱誠來支持，而能由專爲此種目的而成立的國際性的執行機構來主持，並由國際間共同供給經費。這並不是過奢的希望。以往二十年來的許多教訓中，最明顯的一個，就是不但有教育上的縮軍必要，而且任何地域的教學，還有穩定明

繼而多事，其目的在於使歐洲上流社會轉變必要。這是戰後歐洲安全保障，世界任何永  
久國際組織之必要條件。

1  
85

重慶市圖書館藏書查閱存證